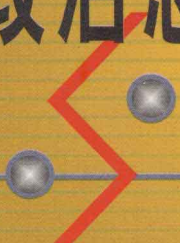


ZHONGGUO WAN JIN ZHENGZHI SIWEI YANJIN

政治学与行政学丛书

中国晚近政治思维演进



◎ 侯西安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中国晚近政治思维演进

侯西安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光朝

版式设计:朴贤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晚近政治思维演进/侯西安著.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2. 12

(政治学与行政学丛书/林修果、何贻纶、张华荣总主编)

ISBN 7-80648-896-0

I. 中... II. 侯... III. ①政治思想史-世界-晚代
②政治思想史-世界-近代 IV. 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7423 号

中国晚近政治思维演进

侯西安 著

*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

福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0.5 印张 254 千字

ISBN 7-80648-896-0/D·13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政治学与行政学丛书

总 主 编	林修果	何贻纶	张华荣
副总主编	赵麟斌	杨立英	林少敏
	侯西安	李宗楼	李应春
	张玲枣	谢金森	张 莉
	曾盛聪		

序

20 世纪以来的一百年是政治学与行政学飞速发展的一百年,各种理论精彩纷呈,学派林立,每一次理论上的重大发现,都深刻地影响和指导着现实社会政治和行政管理的发展。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政治学与行政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极为活跃,充分体现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最新进展。

政治学与行政学是两门历史悠久但在中国却很年轻的社会科学基础学科。所谓“历史悠久”,是指远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和有史记载的古代中国,人们对政治问题与行政管理问题就曾有过研究;说它在中国还很“年轻”,是指政治学与行政学在中国的发展几经波折,直至改革开放后才获得新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政治学与行政学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推动并创新着中国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学科设置、内容体系、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都普遍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政府的行政管理水平,是其经济起飞、社会发展以及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的必要条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府在关注社会经济文化政策的同时,也应关注自身,关注政府如何制定政策、如何执行政策、如何增进全社会的政治文明。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地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改善政府的政治运作和行政管理上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提出了国家政治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系列举措,有些举措很成功,但有些却不尽人意、论争频频。因此,一方面是日趋高涨的改革要求,另一方面是日渐尖锐的批评意见。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政界和学术界都认识到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是门科学,必须十分慎重,必须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和周密、系统、科学的改革方案,应当以正确的政治观、行政观和改革观在全社会的普及、内化为基础和先导,改革才能最终获至成功。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应自觉地担负起传播先进理论的任务。

党的十六大报告鲜明地指出,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目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为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指导思想。

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由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林修果教授等主持编写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列丛书顺利出版。全套丛书的编写,严格遵循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为方向,理论联系实际,在着重阐明政治学

与行政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历史流派、思想渊源的同时,强调立足中国现实,吸取和借鉴国内外研究的最新成果,追踪当今政治学与行政学学术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使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在丛书中得到有机统一,也较好地处理了全书的前瞻性与现实性、时代性与相对稳定性结合的问题。此套丛书既是对当前国内外政治学与行政学理论研究综合集成的学术著作,又可作为大学本科教学的一般教材,合二为一,反映了作者坚持教学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坚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

丛书全套 260 万字,从构想到定稿历时两年,是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行政管理学教研室与兄弟院校教师辛勤劳动、集体协作的产物。编著这样一套大型丛书,工程大,耗时长,其中繁难艰巨可想而知,疏漏偏忽之处也在所难免,有些问题还可进一步深探力索,就总体而观,毕竟瑕不掩瑜,相信丛书所涉论题在编著们的进一步研究探讨中将会逐步的深化、充实和完善,更大的研究成果可期待于来日。

福建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李建平

2002 年 12 月 14 日

目 录

序.....	李建平(1)
第一章 中国近代以前政治思维演进逻辑概说.....	(1)
一、历史观与政治方向的选择.....	(1)
二、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核心.....	(21)
三、中国政治思维的文化基础.....	(38)
第二章 中国政治思维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48)
一、新生产方式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壤中萌生.....	(48)
二、以不变应万变的极端政治文化守成派.....	(58)
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与观念的滥觞.....	(63)
第三章 穿着西洋文化外衣的竞争者——太平天国运动 ...	(73)
一、洪秀全的政治理想.....	(74)
二、洪秀全政治理想的实现.....	(83)
三、洪秀全政治理想的蜕变和余续.....	(90)
第四章 “中体西用”论的实践者——洋务派	(99)
一、洋务派的产生和阵容.....	(99)
二、洋务新政的基本内容	(106)
三、“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哲学	(109)
第五章 政治文化基因的再造者——维新变法派.....	(116)
一、维新派的由来	(116)
二、康有为悄悄进行的政治文化革命	(126)

三、梁启超——中国近代政治文化重建的主将	(143)
四、严复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哲学观	(151)
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活动和结果	(160)
第六章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民主宪政思想	(172)
一、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政治学说	(172)
二、三民主义政治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	(187)
三、章太炎庞杂而深邃的政治思想	(198)
第七章 近现代政治思维的分水岭	(211)
一、清王朝的灭亡和新的政治文化出现在中华大地 ..	(212)
二、义无反顾的政治文化创新和价值观念重建	(231)
三、新文化运动所取得的思想成果	(248)
第八章 革新与反动双重性格的中华民国	(270)
一、洗心革面再造民国	(270)
二、保守、反动是中华民国的另一面属性	(283)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300)
一、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接受的历史根据	(300)
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迅速地领悟和接受	(307)
主要参考文献	(318)
后 记	(321)

第一章 中国近代以前政治思维 演进逻辑概说

一、历史观与政治方向的选择

与以希腊文化为传统的西方文明相并列,中华文化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另外一支没有发生断裂的文化。在六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在东北亚这片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到茫茫的蒙古高原、西北到达中亚地区、西南到达“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南临印度半岛、东南到达中南半岛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江河淤积的肥沃平原为发祥地,通过不同的人群共同体的不断地协作、联合、交流和战争、征服、杀戮的方式,实现着不同的人群共同体融合和发展,逐步形成有共同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这一大人群共同体。在统治和管理越来越众多的大人群共同体的政治实践中,我们的先人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奠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政治路径,养成了中国人自己独特的政治心态和政治行为方式。只有认真地研究这些政治文化,我们才能认识清楚在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与制度的强烈冲击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与观念演进的逻辑与历史出发点。而商代的政治思维则是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发轫期。”

1. 强烈宗教氛围下的商代政治文化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黄河中下游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代。夏代建国前是一个由夏部落和东夷部落组成的强大部落联盟。传说夏禹的儿子启破坏了这个部落联盟首领由夏、夷

部落轮流担任的传统，夺取了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从此开始传子的世袭制度，这就是后代文献所说的“天下为家”^①。由此可知，夏代国家是从父系氏族社会蜕变而来的。蜕变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世袭制度没有废除氏族制，而是把父系氏族制度推广开来，用以管理国家。与此相应，宗教意识也在发生变化。传说颛顼禁止人们自由祭祀鬼神，命令他的一个孙子重管理祭祀天上诸神的事务，另一个孙子黎管理祭祀地上诸神的事务。这就是最初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他们垄断人与神之间的交往，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经过这些教职人员的改造，原始宗教开始变成人为宗教。《墨子》引用古书说，禹进攻三苗、征伐有扈氏的战争都是假借神意进行的，说神要惩罚这些部落，自己是“共(恭)行天之罚也。”宗教观念的政治色彩在这里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由于直接史料缺乏，现在还不能对夏代宗教思想作进一步叙述，而殷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发现，使我们对于殷代和西周的宗教思想和政治文化有了较多的了解。

公元前十六世纪，黄河下游的商部落强盛起来，灭掉了夏朝，建立起商朝。商朝的第二十位国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一带），所以商代也称殷或殷商。商代统治了包括今河南全部和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湖北、安徽的大部或部分地区，建立起一个空前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自称“余一人”、“予一人”。当时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②，宗教祭祀活动和征服战争是商代政权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央政权设立尹和太史，辅佐商王管理国家大事。尹和太史之下又设立名目繁多的官吏，主办各种政治事务。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实行一种外服制，把地方划分为侯、甸、男、卫四服，进行行政管理。旧有的氏族制度保存

① 《礼记·礼运》。

② 《左传》成公十三年。

下来了,但氏族关系中出现了社会化的阶级关系的新内容。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宗教思想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上帝为至上神的一元神宗教代替了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

殷人把现实世界叫做“下”的世界,把神的世界叫做“上”的世界。正像在“下”的世界有一个王是最高统治者一样,在“上”的世界里也有一个至上神是最高统治者,这就是“帝”或称为“上帝”。也正像“下”的世界里,王有许多臣吏分管各种事务一样;在“上”的世界里,上帝也有许多臣吏分管各种事务。自然神如日、月、山、河等神灵都失去了独立性,成为执行上帝意志的工具。

殷人的宗教是祖先一元神的宗教。他们祭奉的至上神上帝也就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亦即卜辞中的“高祖夔”,有种种的神话传说为证。卜辞中的高祖夔就是《山海经》的帝俊,也就是《帝王世纪》中的帝喾和《国语·鲁语》中的舜。而这位殷人的始祖是人王还是上帝呢?《山海经》中说帝俊是许多圣贤的父亲,是峨皇的丈夫,好象是人王;同时又说 he 生育了太阳和月亮,又明显是上帝。殷人的上帝就是殷人自己的始祖,这是一个证明。《左传·昭公元年》说,商的始祖高辛氏(帝喾的号)的长子阍伯是陶唐氏的火正,居住在商丘,祭祀大火星,用火星来定季节。这就证明了陶唐氏即是“后帝”了,而传说中的帝舜(帝喾)又是受陶唐氏的禅让而为王的,这就是说,殷人的始祖接受了上帝的禅让。这又提供了殷人的上帝就是殷人自己的祖先的证明。玄鸟的传说也是殷人帝祖合一宗教观念的证明。传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①,是说殷人的女性祖先简狄吞了玄鸟的卵,因而怀孕,生下契来。玄鸟是上帝派下来的,故而契是上帝的儿子。

殷代政治思想的其它特点,或多或少都与帝祖合一观念有着

① 《商颂·玄鸟》。

内在的联系:其一,殷人尊天事鬼的迷信观念浓厚,占卜盛行,各地的殷商遗址中都有卜骨发现。从安阳殷墟出土的王室卜辞来看,从天时、年成、祭祀、征伐到商王个人田猎、疾病以及做梦和生孩子等等,都要通过占卜、求问上帝。可见在原始宗教里自然神和祖先神的职责,在这里集中于上帝一身了。其二,政权与教权结合。作为上帝的后裔,殷王不仅是政权的最高代表,也是宗教的最高祭司。凡重要宗教仪式都由殷王主持。占卜资料都有政府史官做册负责保管,成为政府档案。思想文化完全由在各级政权机关的官吏掌握,没有脱离政府官吏身份的独立知识阶层,这种状况叫做“学在官府”。“学在官府”的状况一直延续到西周和春秋时代,到了春秋晚期才开始改变。殷人既然把自己的祖先和上帝一体化,也就要求外族属国祭祀殷人的祖先。周原考古发现的甲骨文中,编号为 H11:1 的一片卜辞记载,周人用二女及羊、豕为牺牲祭祀殷人先王成汤和帝乙。另一片编号为 H11:84 的卜辞记载,周文王通过占卜祈求殷先王太甲的保佑^①。殷商王朝的政治势力伸展到那里,殷人祖先的威灵也就伸展到那里。其三,殷人把人间一切权利义务关系都纳入祖宗一元神崇拜的宗教之中。我国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家侯外庐研究卜辞中记载的殷代先王称号得出结论说:殷代诸王的名字都没有道德的含意,即没有文明社会权利义务的关系,直到殷末才开始出现“文”字,作为文明起点的证件。历代殷王的名号都有祖先崇拜的印记,殷王名号中的祖、示、王、父、土诸字都具有这一含义。相反,周代诸王的名号如文、武、成、康,皆继承殷末的文明,接受了殷人的思想意识,扩大而为道德观念。

2. 畏天法祖、敬德保民的西周王朝政治文化

公元前十一世纪在渭水流域发展起来的周人灭掉殷商,建立

^① 见《文物》1979年第10期载《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

起领主封建制的周朝。周朝建立至平王迁都洛邑,这段时间约近三个世纪,史称西周。西周的疆域比商代辽阔,从现在北方的辽宁到南方的长江以南,西方的甘肃东部到东海之滨,都成了西周的统辖范围。西周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仍然是宗教,宗教思想依然是世界观、政治理论和伦理思想的基础,这一点与殷商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周朝总结吸取了殷代灭亡的教训,由于宗法制度的确立,殷周之际宗教思想发生了变化,周人宗教思想中有不少创新,并非完全承袭殷商宗教观念。

上帝和祖先神分离是西周宗教思想的一个创新。周人继承殷人崇拜祖先的观念,认为祭奉祖先是子孙的神圣义务。周武王即以不敬祖先为殷纣王的大罪。《牧誓》中说,殷纣王“昏弃厥肆祀(对祖先的祭祀)弗答”,因而必须伐纣。《尚书》、《诗·周颂》和西周金文中都有大量崇拜祖先神的记载。但周人的至上神不是祖先神而是天,或称帝、上帝。周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上帝的儿子,被派到下界来做最高统治者,死后灵魂回到天上去,仍然是天的下属。金文中反复说“先王其严(灵魂)在上”,“先王其严在帝左右”。许多青铜器铭文中都有器主祈求天或祖先保佑的词语,即对自身和子孙的祝福词,这叫嘏词。嘏词反映,天是主宰人类祸福的全能神,每个人的生死寿夭、穷通祸福、利禄爵位都由天帝主宰。王取得国家统治权叫“受命”,得到贤能的辅助叫“受屏”,把政权维持下去叫“永保天命”。天下大事更是取决于天的意志。天能赐福也能降祸,周人的言论中常有“受命于天”一类的说法。而祖先神则永远是母亲般的慈爱,从不降祸给子孙后代。

由此不难看出,祖先神与至上神分离的历史根源是氏族社会观念的影响。氏族社会的自然神是各氏族部落共同的信仰,祖先神则是各氏族部落不同的信仰。祖先只是本氏族部落的保护神不能主宰其它氏族部落的命运。西周滕器(陪嫁器皿)铭文中的嘏词

都以天为祈求对象,没有祈求祖先的。在周人的观念中,已经出嫁的女性子孙既已属于他族成员,本族祖先就不能加以保护,这正是氏族社会观念。更为重要的是,祖天分离具有现实的根源。周人灭商,周王室取代商王室做了天下的共主,面临着一个如何解释自己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周武王虽然以荒废“肆祀”作为讨伐殷纣王的理由之一,无论如何不能设想殷人祖先命令周人灭亡殷国。周武王动员庸、蜀、羌、茅、微、卢、彭、濮人共同讨伐纣王,仅用周人祖先神的名义显然是不够的,所以绝口不提祖先神,而宣称要“恭行天罚”,这里说的“天”就包含着不同于祖先神的意义。周灭商之后,分封了大批姬姓贵族的同时,为了笼络人心,在“兴灭继绝”的名义下册封黄帝后裔于蓟、帝尧后裔于祝、帝舜后裔于陈、夏人后裔于杞,还为殷人保留了一个宋国,让殷人祭祀自己的祖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周人宣布其统治权是本族祖先授予的,怎么能排除他族的祖先命令其子孙反抗周人统治的可能性呢?有了区别于祖先神的至上神天,就有了各族必须共同尊奉的权威。

“天命”可以转移,这是周人宗教思想的另一个创新。殷人、周人都认为统治权是神给予的,在这一点上没有不同。不同的是殷人没有“天命”可以转移的观念,一切依恃“天命”,忽视人为努力。直到商崩溃的前夕,纣王还说什么“我生不有命在天”^①,终于招致亡国。这个历史事实对周人是深切的教训。周人经过太王、王季、文王三代人的努力,到武王才灭掉殷国,取得天下的统治权。怎样把政权保持下去而不重蹈殷人亡国的覆辙,是周人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他们认真总结了殷商兴灭的历史经验,并追溯到夏代的灭亡史。《尚书·周书》中许多篇章都在讨论这一问题。周公等人的看法是:“天惟时求民主”^②,天随时都在寻找适合于做人民

① 《尚书·西伯戡黎》。

② 《尚书·多方》。

君主的人。最初选中了夏人,后来夏人“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所以天抛弃了他,命令商汤“简代夏作民主”^①。商汤以及中宗、高宗、祖甲历代英明的殷王励精图治,谨慎戒惧,不敢过度享乐,使殷商统治权延续下来。祖甲之后历代殷王“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②,到了殷纣的时代更是胡作非为,不知反省和悔改。天又“简畀殷命”,让周人取代殷王作民之主,并要求周人贵族学习夏、商英明的国王,而把夏、商昏庸的国王导致亡国作为历史教训,引以为戒。这种天命可以转移的宗教思想表明,周人在探求三代更替的原因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文化观念。他们在寻找王朝兴替的因果关系时,虽然没有脱离宗教神学,却把注意力转移到人事方面。他们承认天意主宰人事,却又让人事制约着天意,多少肯定了人的政治文化活动的能动性和政治行为选择的重要性。周人进一步探讨了怎么的政治行为选择和政治思想,才能永远保证上帝的垂青和“天命”的永驻而不发生“革命”,实现天命的转移,为此,周人提出了“孝”、“德”的范畴。“孝”字在西周金文中是在祭祀祖先时有所奉献的形象。周人认为“追孝”、“享孝”祖先,对祖先“继序思不忘”,可以祈福长寿,使族类获得幸福。并将其含义从“事死”扩大到“事生”,认为孝的对象不仅有父母、祖父母,而且包括宗室、宗庙以及兄弟、朋友、婚媾(有婚姻关系的宗室诸侯)。这样,“孝”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范畴。周人提出的“德”是处事得宜的意思,包括敬天、孝族、保民三项内容,运用在政治上即是要求明察和宽厚。周公反复说明,周人取代殷人受命,是修德所致。文王“命德慎罚”^③,缔造了周国,武王效法文王努力奉行宽厚的大德(“容德”),得到了天的欢心,才得以代殷受命。只

① 《尚书·多方》。

② 《尚书·无逸》。

③ 《尚书·康诰》。

有继续推行德政,才能维持天命不坠。可见“德”比“孝”的含义更为广泛,更着重于现实生活,又与“孝”密切联系,所以西周文献中常以“有孝有德”^①并列作为贵族品质的基本要求。

周人的伦理政治思想与宗法制度有密切关系。从周王到大夫的各级统治者,都是嫡长子继承父位,诸子分封为次一等级的统治者,整个国家形成一个以血缘维系的统治网。血缘成为政治的纽带,维持宗法关系就是维持政治秩序。《诗·大雅·板》说:“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大诸侯国就是王室的屏障,百姓(各级大宗贵族)就是国家的栋梁,宗子就是城疆。德和孝从宗法制度产生,又为宗法制度服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被奉为天神规定的人间关系(“民彝”),神圣不可侵犯,违背它被看成极大的罪恶,要处以刑罚。这说明周人是从巩固政权的角度强迫人们遵循宗法道德的道德带有政治强制的性质,并不仅仅是舆论的力量。

从夏商一直到西周这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滥觞、发展和初步定型化的重要时期。特别是西周的三四百年历史,虽然还带有殷商社会浓烈的祖先崇拜的韵味,但终归在寻找新政权统治合法性的根据的思索中把注意的焦点投向人事的“孝”、“德”,开启了中国政治控制和管理中强烈人文色彩的传统。

3. 春秋时期:人文主义的政治文化大放异彩

春秋战国即我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伴随着西周以来的封建领主制经济的弛废,建立在封建领主制经济之上的政治文化逐步改变。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各种政治学说激烈交锋与竞争,为实现由传统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基础上的向周天子朝贡的政治文化,向新的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上的皇权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转变,创设新的政治文化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

^① 《诗·大雅·卷阿》。